

台灣原住民選民投票參與之研究

包正豪、周應龍

淡江大學

摘要

投票參與程度是統治正當性與民主品質的關鍵因素。探索選民投票與否的背後原因，也因此成為解析統治正當性和研判民主品質的重要途徑。長期以來，原住民立委選舉的投票率均遠低於一般區域立委選舉，似已經產生政治疏離的現象，因而使得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權統治欠缺原住民選民予以背書的正當性。有鑑於此，本研究乃以2013原住民政治行為與態度調查為資料分析來源，以2008與2012兩次立委選舉為比較個案，嘗試釐清影響原住民選民投票參與的關鍵因素。

研究結果顯示，政黨認同與政治賦權是影響原住民投票參與意願的最重要因素。國民黨 / 泛藍長期宰制原住民政治，民進黨 / 泛綠候選人勝選機率極低，使得其支持者去投票的效益極低，因而傾向不去投票。因此原住民選舉政治的變異性提升，將有助於提高原住民的投票參與程度，進而強化政府統治的正當性與維繫民主品質。其次，政治賦權現象確實反映在原住民選民投票參與行為上。但政治賦權對投票參與的影響程度會受到合併選舉與否的干擾。當合併總統選舉投票時，政黨為求勝選而全面性動員時，會提高整體投票率，但同時稀釋政治賦權的影響。

關鍵詞：原住民、投票參與、政治賦權、投票成本

包正豪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為原住民政治、國會研究、選舉與投票行為、政黨政治。

周應龍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政治學方法論、調查研究、投票行為、政黨政治。

(收件：2015/1/8，修正：2015/3/9，接受，2015/6/5)

壹、緒論

競爭性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徵。透過競爭性選舉而獲得公民的選票背書，是政府行使權力正當性（legitimacy）的來源。所以，投票率高低經常被化約成爲民主參與的指標。低投票率被認爲對民主政治是不好的，往往被解讀爲代表性不足，繼而給予他人質疑統治正當性的機會（Powell, 1982; Teixeira, 1992; Wattenberg, 2002）。因此，當歐美民主國家普遍面臨投票率下降而可能對民主價值造成傷害的糾葛之際，西方政治學界，特別是美國，在研究選民投票行爲時，除重視「投票抉擇」外，也同樣關注「投票參與」的議題。然而，在台灣社會當中，「投票率」似乎並不是個嚴重而值得關注的問題。以總統選舉爲例，1996年首度舉行總統直接選舉，投票率達76.04%。2000年總統大選的三角激烈競爭，更將投票率推高到史無前例的82.69%。2012年總統選舉投票率創下新低，社會輿論對此憂心忡忡，甚至視爲民主危機。但這年的投票率是74.38%，較諸歐美國家約平均約五成的投票率而言，仍爲高度參與型態。由此觀之，台灣政治學界較少關心投票參與，似乎順理成章。

然而在看似高度參與的背後，鮮少被注意到的是，台灣原住民選民的投票參與率遠低於漢人選民。基於保障原住民政治參與之故，在制度上，原住民選區是單獨畫出，依身分別而限定僅有平地或山地原住民方得參與。這種專屬選區制度雖然保障了原住民在國會當中的席次，但是也制度性地將原住民孤立於台灣主流政治之外，致使原住民政治長期處於「靜態發展」，選舉結果鮮有變異，而呈現國民黨宰制原住民政治的結果（包正豪，2011:88-89）。既然參與與否似乎都無法改變既有權力分配結構，去不去投票也似乎就無關宏旨。輔以原住民多爲社會經濟弱勢，社會經濟結構的快速變遷迫使原住民必須離開原鄉部落，到都市討生活（包正豪、謝顯音，2013）。沉重的經濟生活壓力又提高了返鄉投票的實質成本，更讓原住民不願出來投票。於是自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以來，原住民立委選舉的投票率就不曾高過六成，2004和2008兩屆平地原住民

立委選舉投票率更低到45%以下，同時舉行的山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的投票率也只是略高於五成而已。^① 而與投票率逐漸下降相始終的是，原住民族同胞對國家 / 政府歸屬感的日漸疏離。

然而這些有關原住民投票參與程度低落的討論，大部分仍處於理論論述階段，而未獲實證經驗證據驗證。換言之，我們並不確知原住民選民比較不去投票的真正原因。前述論及原因，均屬理論上的邏輯推論、臆測或是社會傳統觀點（conventional wisdoms）。因此，有必要透過實證研究來驗證這些理論論述。如欲探討「個人」的投票參與行為，研究的分析架構與單位以個體為出發點，應為恰當。而要探究選民為何投票，現階段台灣學界主要分析所能使用的資料多為大型研究計畫，譬如「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或「台灣社會基本變遷調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等所蒐集的個體調查資料，透過建構模型的統計分析，探索選民從事政治行動的背後動機、來源與思考模式，進行理論驗證。但令人尷尬的是，由於原住民選民佔全體選民的比例極低，該類調查資料當中能夠使用的樣本是極其有限的，通常僅有寥寥廿或卅餘個而已。用以分析推論整體原住民的投票行為，有高度推估不穩定的風險。此外，原住民政治有其特殊性，TEDS或TSCS等調查並不會刻意蒐集此類資料。譬如在族群歸屬問題上，只會詢問是否為原住民，而未考慮原住民族內的族群差異，而進一步追問是哪一族。這使得原住民政治行為的個體層次實證研究難以進行。

因此，若試圖解答為何原住民比較不願意投票的問題，我們需要分析以原住民為母體且依據原住民社會政治現況而設計問卷的抽樣調查資料。有鑑於此，本研究將以「2013原住民政治態度與行為調查」為分析資料來源，藉由量

^① 2004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投票率為44.21%，而2008更降到42.88%。山地原住民立委選舉投票率則分別是2004的53%和2008的51.55%。

化分析方法來嘗試探索並釐清原住民投票參與的影響因素。以下，作者將首先檢閱相關研究文獻，探討選民投票參與的分析理論與研究焦點，同時陳述本研究的切入觀點。而後繼之說明本文運用的研究設計與假設，以及所使用變項的操作型定義；再其次是進行實證分析，首先對「2013原住民政治態度與行為調查」的資料做描述性統計分析，而後再建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 model)，探討影響原住民投票參與意願的影響因素；最後則是對統計分析結果，提出看法與心得，並檢討研究限制。

貳、少數族群的投票參與

選民投票參與呈現下滑趨勢是民主國家普遍所見的現象，而早於1950年代末期，即有政治學者開始嘗試釐清影響選民投票參與的因素。Downs (1957) 從參與的效益 (utility) 出發，發展出計算個別選民投票參與預期效益的方程式模型： $R=PB-C$ 。^② 如果R是正值，表示投票參與的預期效益大於成本，前往投票將是個理性計算下的決定，反之則否。換言之，投票參與的效益高低決定個別選民是否前往投票。但是Downs的理性抉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的問題在於難以解釋實際選舉參與投票情形。在一般情形下，個人選票決定最終選舉結果的機率趨近於零，而投票成本始終存在，因此上述方程式的「解」將為負值，預期效益小於成本，而得出理性選民不應該前往投票的結論；也就是說，去投票的選民事實上是不理性的 (Riker and Ordeshook, 1968:25；吳俊德、陳永福，2005:69)。

Riker與Ordeshook (1968) 因而修正Downs的模型，導入「公民責任」(citizen duty) 變項，而發展出「投票理性計算模型」(rational calculation of

^② R是投票的預期效益、P是個人選票決定最終選舉結果的機率、B是出現對個人有利的選舉結果而能獲得的利益，C則是投票成本。

voting model)： $R=PB-C+D$ （ D 即為公民責任）。^③ 渠等主張，縱使個人選票影響選舉結果的可能性極低，而投票成本相對高昂時，屬於無形之內在利益（intrinsic benefits）的公民責任感，即成為選民前往投票的最主要動機。Ferejohn與Fiorina（1974）則建構「極小化最大後悔模型」（minimax regret model），認為選民的投票參與並非主要受到公民責任感的驅使，而是為了避免個人支持之候選人落選的一種決策行為。而後，政治學界即有相當文獻依循理性抉擇邏輯去探究影響選民投票成本與預期利益的因素，而聚焦於投票效益因素的討論（Aldrich, 1993; Palfrey and Rosenthal, 1985）。至於投票成本與公民責任感等因素的文獻探討，則通常建立在與個別選民之人口與社會特徵的理論連結上（黃紀、林長志，2013:57）。

其中有關投票成本的討論，早期研究多以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s）的觀點來測量投票成本，譬如以不同職業類別者的時薪換算出個別選民前往投票的實際成本，得出投票成本隨個人經濟狀況相異，而成本愈高者愈傾向不去投票的結論（Frey, 1971; Tollison and Willett, 1973）。但後續研究發現，所謂機會成本的概念恐有誤解。理由在於投票時間往往持續整日，而投開票所普遍距離住家很近。換言之，所謂的投票成本，不過是記得投票日的心理成本，以及往返投開票所與住家之間的交通成本之類的總和而已。更何況人們總是會在日常生活當中做些與工作無關，而無法獲得報酬的事情。花點時間去投票，與此類行為無異（Niemi, 1976:115）。結合個人投票抉擇影響選舉結果的低可能性，投票因此成為一項低成本和低報酬的政治參與行為（Aldrich, 1993; Ordeshook and Zeng, 1997）。不過近期研究則發現，投票距離（voting distance），即住家與投開票所之間的距離，會影響選民的交通與資訊成本。當距離增加時，花在往返住家和投開票所的時間與金錢成本，就未必是微不足道的小事（Haspel

^③ 有關社會責任對投票參與的影響，其實Downs（1957:267）曾提及「民主政體下的理性選民會因為社會責任而相對地不受到個人短期得失的影響而去投票」（rational men in a democracy are motivated to some extent by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their own short-run gains and losses），但Downs並沒有將其納入模型解釋之中。

and Knotts, 2005)，而會導致選民較不願意前往投票的結果（Bhatti, 2012; Brady and McNulty, 2011; Dyck and Gimpel, 2005; McNulty, Dowling, and Ariotti, 2009）。

此一觀點放在台灣選舉制度的框架下，似言之成理。台灣現行選舉相關法規規定，選民必須在其戶籍所在地的投開票所投票。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環境變化，民眾在島內自由遷徙，卻未必把戶籍遷到現住地。因此，在沒有「不在籍投票」制度可供救濟的情形下，這類選民的投票成本較諸其他選民，是有明顯差異的。而相關研究指出，台灣原住民由於故鄉就業機會欠缺，而有大量向北部都會區遷徙的「島內移民」現象，但卻未必將戶籍隨之遷往（包正豪、謝顯音，2013）。換言之，這種「籍在人不在」的現象，使得原住民的投票距離變得相當遙遠。因此，透過理性抉擇理論框架，以投票距離作為對投票成本的再詮釋，或許得以解釋原住民投票參與行為。

除前述以理性抉擇途徑為基礎的研究外，從個體層次出發探討影響選民投票參與的相關研究途徑，還有從所擁有的資源多寡影響選民是否「能夠」參與投票之角度出發的資源模型（resource model）；從政治心理涉入感的高低影響選民是否「願意」參與投票之角度出發的心理涉入模型（psychological engagement model）；乃至於從政治動員角度來探索選民是否為被接觸動員而「提高」投票意願之動員模型（mobilization model）等三大類研究途徑（Blais, 2007:631）。大體而言，這三類投票參與解釋模型著重於探討選民人口特徵與社經背景、社會涉入程度、政黨認同、政治資訊多寡和政治興趣與知識的高低、對選舉制度的熟稔程度，乃至於公民責任感等個人特質與心理態度，對投票參與的影響。而相關研究結論大致肯定擁有資源愈豐沛、社會活動與組織涉入程度較高、政黨認同較強、政治興趣較大且有較多政治知識，以及將投票視為公民責任者，較傾向於選舉時出來投票（黃紀、林長志，2013:49-51）。^④

^④ 相關文獻的細部討論，黃紀、林長志（2013）已有系統性的討論，建請有興趣者逕行參閱該文，於此不再贅述。

前述各項變數當中，政黨認同被認為是投票參與的重要影響因子。早於1950年代，美國政治學者即利用全國性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具有政黨認同的選民是比較傾向前往投票的（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 1954）。初期後續研究亦證實政黨認同與投票參與之間的正向關係（Campbell et al., 1960）。但Ashenfelter與Kelly（1975）針對此一問題進行研究，卻發現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參與未若預期，實質影響很小，反而是政治效能感的影響才是決定因素。不過，因為自1960年代迄今，美國選民的投票率便呈現長期衰退的趨勢，投票參與持續成為美國政治學界的重要研究議題，有相當數量的相關研究探討。許多實證研究顯示，因為政黨意識形態的差別趨於含糊使得選民無所適從，導致政黨認同影響力弱化與選民投票率降低（Cohen and Collier, 1999; Sears and Valentino, 1997; Wattenberg, 1990, 1991）。因此，循著前述研究邏輯而將兩者聯繫起來，認為政黨認同依然是影響選民投票參與的決定性因素（Cassel and Hill, 1981; Abramson, 1983）。

但政黨認同是否能夠解釋台灣原住民選民的投票率低落問題？目前國內並未有任何相關研究討論。事實上，雖然從選舉結果來看，原住民選民的投票抉擇大多是支持國民黨籍的候選人，因而社會上普遍直觀地認為原住民選民的政黨認同是偏向支持國民黨的。但是這樣的連結並沒有道理可言，只是臆測和斷言而已。投票支持國民黨不等同於認同國民黨。投票抉擇和投票參與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原住民選舉結果傾向支持國民黨，並不同於個別選民會因此去投票。所以，有關政黨認同與原住民選民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尚待實證研究分析釐清。

承以上討論，可以發現投票參與恐非單一因素決定，而會受眾多因素彼此交互作用的影響。過往研究在探討影響投票參與決定的關鍵因素時，所使用的統計分析策略多傾向以自變項對投票參與的影響是否顯著，來證明該理論的適用性。這些研究幫助我們了解投票參與是會受到上述種種人口學變項、政治心理變項，以及投票成本效益變項的影響（廖益興，2006:188-90）。但這些發

現均是在一般性選舉的框架下所進行研究而得到的結果，並沒有特別考慮影響少數族群在多元文化社會內政治 / 選舉參與的其他因素。事實上，早期少數族群投票參與相關研究多從資源模型的「社會人口因素」(socio-demographic factor) 觀點出發，認為少數族群的低度政治參與肇因於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 (Verba and Nie, 1972; Welch and Foster, 1992)。但自Jones (1978) 觀察到在1973年美國亞特蘭大市選出黑人市長Maynard Jackson後，該市黑人選民政治信任和投票參與率提升的現象，Jones稱之為「黑人政治賦權」(black political empowerment)。此後，政治學者即致力於探討政治賦權如何影響少數族群的政治信任、政治效能、自我認同，乃至於社會與政治參與 (Bobo and Gilliam, 1990; Gilliam, 1996; Gurin, Hatchett, and Jackson, 1989; Hackey, 1996; Leighly and Vedlitz, 1999; Tate, 1991)。

依據Bobo與Gilliam (1990) 的詮釋，政治賦權與少數族群投票參與的關聯性植基於當少數族群獲得明顯的族群政治代表並取得決策影響力後，少數族群民眾將「被賦權」(empowered)，繼而影響其對於投票成本與效用的看法 (1990:379)。換言之，少數族群民選公職人員的出現會傳達「投票的效用高過不投票的成本」給少數族群選民，讓他們感到參與本身就有其固有價值，因而樂於參與投票 (1990:387)。其後，延伸此一研究邏輯，政治賦權與投票參與相關研究個案，即自美國黑白種族政治議題，擴及其他國家的少數族群研究，如紐西蘭 (毛利人)、法國 (馬格里布裔與土耳其裔移民)、^⑤ 台灣 (客家人) 等個案研究，並均發現少數族群有因為政治賦權而提高投票參與的現象 (Banducci, Donovan and Karp, 2004; Brouard and Tiberj, 2011; 吳重禮、李世宏, 2005)。

^⑤ 馬格里布 (Maghreb) 係主要指法屬非洲殖民地的人民，原本指涉的是現在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等西北非洲國家，但法國在定義少數族群時，有時也會將法屬西非 (塞內加爾、馬利、茅利塔尼亞) 裔的移民及其後裔歸於此類。

雖然這些個體調查經驗資料的研究，均證實政治賦權與投票參與之間有顯著正向相關，但由於少數族群的人口規模普遍偏小，反映在樣本規模上，受此限制，致使部分研究必須承受推論不穩定的風險。^⑥ 因此，在欠缺為研究少數族群政治行為而特意設計的調查資料可運用的情形下，有學者嘗試運用總體層次資料來驗證賦權理論的適用性，但研究結論頗為分歧。其中Gilliam與Kaufman（1998）分析地方層級選舉紀錄，發現黑人候選人能夠促進黑人政治利益，因而提高美國黑人的投票參與率。但Lublin與Tate（1995:253）則發現，若現任者與挑戰者均為黑人時，反而會使得投票率下降。Gay（2001）更進一步用區位推論模型（ecological inference model）來估計，在有無黑人擔任國會議員的條件下，各國會議員選區內黑人與白人選民投票率，卻觀察到選出黑人國會議員對提高黑人選民投票率的影響不顯著的結果。^⑦ 包正豪（2013）針對台灣原住民選民投票參與情形，以2008和2012兩屆立委選舉之投開票紀錄為資料來源，進行分析。在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部分，其研究發現呼應Lublin與Tate（1995）的研究結論，現任者與挑戰者均為阿美族人，政治賦權因素對投票參與的影響為負向。但在族群組成結構比較複雜的山地原住民部分，則未觀察到穩定一致的趨勢。2008的分析結論傾向肯定政治賦權對原住民投票參與有正面影響，而2012則是觀察到與Gay（2001）相類似「影響不顯著」的現象。

^⑥ Bobo與Gilliam（1990）是用1987 General Social Survey的資料，加重黑人樣本抽樣而取得544個有效樣本；吳重禮、李世宏（2005）使用「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資料，客家樣本為245。Brouard與Tiberj（2011）使用法國政府資助的Rapport au politique des Français issus de l'immigration: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French immigrant origin (RAPFI) 調查資料，可供分析的有效樣本（非裔與土耳其裔）達1,003個，但若從事次母體推論（依歸化前或父母的國籍區分），則各次母體樣本數均低於300。不過，Banducci、Donovan與Karp（2004）的資料來源是特別為研究毛利族群政治態度與行為設計的1999 New Zealand Election Study，共抽出1,000個毛利樣本，是上述所提及的研究當中樣本數最多，推論風險較小的一個。

^⑦ Gay的研究係以1990年Georgia、Michigan、New Jersey和Pennsylvania和1994年Maryland、Missouri、Tennessee 和Virginia等八個州國會議員期中選舉中的102個選區為研究個案。但由於各選區內黑白人選民比例懸殊，Gay承認這會導致以「生態推論」方法對少數族群投票參與進行估計時，會有相當大的誤差可能性（Gay, 2001:594）。

綜合以上研究政治賦權對投票參與之影響的相關研究發現，看似無一致結論。但我們可以觀察到，多數研究的結論均肯定少數族群的政治賦權對投票參與有正面影響。研究結論相異者，若非有特定條件限制，譬如現任者與挑戰者均來自同一少數族群 (Lublin and Tate, 1995；包正豪，2013) 或有研究方法上可能無法避免的估計誤差 (Gay, 2001)；便是選舉制度有本質上的差異，譬如屬於少數族群專屬選區的研究個案 (包正豪，2013)。

摘述過往與投票參與相關之一般性理論與針對少數族群政治參與的政治賦權理論後，筆者擬檢視台灣原住民相關選舉行為的研究現況，以及前開所探討之相關理論對原住民投票參與研究的若干啓示，以形成研究概念與分析架構和相關假設，繼而檢證研究問題。

參、台灣原住民選舉行為研究現況與投票參與相關研究假設

台灣原住民選舉行為研究尙未有系統性的討論，而以投票參與為研究主題者，更屬鳳毛麟角，但近年來仍有少數研究處理相關研究議題。其中，包正豪 (2011) 運用「區位推論」(ecological inference) 研究方法，分析1992到2008年間歷屆原住民立委選舉投票結果，確認原住民政治版圖是以候選人家鄉為核心而以同心圓模式向外擴散的「地盤」發展模式，並推估出政黨對候選人得票的影響約為50%。此一研究雖未直接討論投票參與的影響因素，但從中仍透露出相當訊息。第一，由於原住民各族群之居住地區仍大致依行政區劃而分布，特定與鄰近鄉鎮內所居住的原住民大多屬於同族。換言之，此一現象暗示原住民選民的投票行為受族群影響很重。包正豪、謝顯音 (2013) 以質化研究方式進行國民黨原住民選舉動員研究的發現，則進一步支持原住民選民投票受族群影響的初步結論。因此，呼應前述有關「政治賦權」對投票參與的影響，理論上我們應該能夠觀察到：「本族有當選立委的選民應該會比本族沒有立委的選民更熱衷參與投票」的現象。

包正豪（2013）曾嘗試使用總體資料，來驗證此一假設，但研究發現頗為分歧。在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部分，阿美族（唯一有立委的平地原住民族）的投票率反而偏低。至於山地原住民立委選舉部分，則是不同年度有不同的影響。2008年泛泰雅族和排灣族（唯二有選出立委的山地原住民族）的投票率確實較高，但2012年則沒有顯著偏高的情形。該研究受限於資料結構，在分析架構上是以「鄉鎮」為單位，並為避免原住民選民數量偏低之鄉鎮資料因為少數選民變動而影響分析結果，設立門檻將部分鄉鎮自分析個案排除。

以台灣原住民分布情形來看，山地原住民之傳統領域基本上與當今行政區劃相符，除少數鄰接其他族群傳統領域的鄉鎮內之族群組成較為複雜外，大部分鄉鎮都是九成以上為單一族群構成。但平地原住民部分則否，除竹苗交接山地地區（新竹縣五峰鄉、苗栗縣南庄鄉和獅潭鄉）的賽夏族外，花東地區的平地原住民雖以阿美族為主體，但其他各族平地原住民雜居情形亦相當普遍。更遑論北部都會地區（北北基）為原住民尋求就業機會的主要遷移地區，各族雜居就更為常態。當該研究以「鄉鎮內特定族群比例」為基準而將該鄉鎮定義為「特定族群鄉鎮」，再觀察不同族群鄉鎮投票率高低的做法，存在推論誤差較大的可能性。而平地原住民部分又比山地原住民部分來得嚴重。致使該研究的發現，較不穩固。因此，藉由個體層次調查資料來分析「政治賦權」對投票參與的影響，驗證前述假設，應為較佳的做法。

不過，該論文於2008與2012在山地原住民部分所觀察到的現象亦令人費解。何以「政治賦權」現象出現於2008，但2012則否？綜觀兩屆選舉，2008與2012原住民立委選舉的主要（有競爭實力）的候選人完全一致，而其他候選人的加入也沒有改變候選人族群分布。平地原住民部分清一色是阿美族，山地原住民部分也是只有泛泰雅和排灣兩族的候選人參選。可以這樣說，2008和2012兩屆立委選舉唯一明顯差異是在於2012立委選舉是和總統選舉合併投票，致使原住民立委選舉投票率從以往分開選時的五成上下，陡然拉高到七成。包正豪、謝顯音（2013）的研究發現，原住民選民投票行為受血親和族群關係影響

甚重。國民黨的選舉動員組織即鑲嵌於原住民社會中的血親關係網絡之中，而對原住民投票行為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包正豪（2011）的研究更推估出國民黨對個別候選人（即便是所謂有個人選票的地方實力派）約五成票源有影響力。結合這些研究發現，我們可以合理假設，政黨因為層級較高影響較大的總統選舉而進行強度較強的動員時，原本較少出來投票的他族原住民選民，也會因此被動員而出來投票。此一變化可能稀釋掉「政治賦權」對投票參與的影響，導致2008政治賦權影響顯著而2012年則否的結果。

若前述有關政黨動員的假設為真，那我們在分析個體層次調查資料時，應該可以觀察到「有政黨認同的原住民選民比無政黨認同的原住民選民更傾向參與投票」的現象，甚至進一步觀察到「有國民黨認同的原住民選民比民進黨認同的原住民選民更傾向參與投票」的現象。

至於從「投票成本 / 距離」的經濟角度來分析原住民投票參與行為的本土研究，於本文之前係為未見，亦無相關討論。然而台灣社會傳統觀點多以「因為投票距離遙遠，所以原住民選民傾向不去投票」來解釋何以原住民選舉普遍投票率偏低。這樣的觀點與西方投票參與相關理論當中的「投票成本 / 距離」理論若合符節。換言之，都會區的原住民選民是已經將戶籍自原鄉遷到都會區的選民，所以這些選民的戶籍地已經改變成為在都會區內。依前述投票距離的邏輯，這些選民的投票距離較短，應該會有比較高的投票率。反觀原鄉地區，地處偏僻，而有相當數量選民因為工作或求學關係而寄寓都會區，所以當這些人因為投票距離遙遠而不願意返鄉投票時，我們應該可以觀察到原鄉地區投票率顯著偏低的現象。因此，本文將建構「投票成本 / 距離」假設並嘗試予以驗證。

肆、研究設計

誠如前述討論所言，本文主要目的在於研究影響原住民選民投票參與的因

素為何。投票參與屬於個人政治態度和行爲，如能夠透過個體層次的調查研究來釐清影響投票參與的因素有那些，自爲較直接的做法。然而有關個體層次的原住民政行爲實證經驗研究，一直都有資料來源取得困難的問題。原因無他，就是由於台灣原住民族的人口規模極小，導致抽出合格樣本的成本過大（包正豪、周應龍，2014）。因此過往國內相關研究，若非使用總體資料進行分析（包正豪，2011），就是透過質化研究途徑從事討論（包正豪、謝顯音，2013），而無法從調查資料分析來討論原住民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爲。此一限制使得相關理論已經概略形成，但台灣學界卻難以建構具推論全體原住民政行爲的個體層次量化分析模型來驗證相關研究理論之適用性。

因此，爲解決原住民調查研究樣本取得困難的問題，研究團隊與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使用該公司所累積的成功樣本資料庫，篩選2007年1月迄今（2013年3月），以全國爲抽樣範圍之調查中，有接受該公司（或該公司委託代工之民調機構）訪問之原住民家戶電話號碼進行訪問，共計抽出4,873個電話號碼，而以這些被篩選出的原住民電話作爲「2013原住民政行爲調查」（2013年9月）的樣本來源。^⑧ 這種作法可有效避免大海撈針式地過濾樣本，不必藉由傳統電話調查，用每打1,000通有效接通電話去累積十數通原住民電話的方式來獲得所需要的原住民樣本。自然有效地降低了樣本取得成本，使得原住民行爲電話調查研究變得可行（傅仰止、簡文吟、伊慶春，2001:110-11）。換言之，「2013原住民政行爲調查」是以原住民家戶電話樣本資料庫爲樣本來源，所進行的電話調查訪問。理論上，可以涵蓋家中有市內電話的所有原住民家戶，具備推論全體原住民政行爲的抽樣理論基礎。^⑨ 因此，本研究將以該調查所得資料爲分析資料來源，以量化分析方法，

^⑧ 計畫經費來源是由淡江大學102學年度重點研究計畫項目下支應，而未受其他任何政府機構、政黨、或利益團體之任何形式的資助。

^⑨ 「2013原住民政行爲調查」之相關方法論討論，請參閱包正豪、周應龍（2014）。

來檢驗前述相關研究所建構之原住民投票參與理論是否為真。

根據前節所做的理論探討與假設建構，本文認為可能影響原住民投票參與的主要因素為政治賦權、政黨認同及投票成本 / 距離。以下首先針對這三個變數的測量方式進行說明，接著以列聯表說明這三個變數和投票參與之間的關聯性。

一、主要變數測量方式

1. 政治賦權

政治賦權對投票參與的影響所指的是，有當選立委的族群之選民會比其他沒有立委的族群之選民更熱衷參與投票族群。2008年和2012年的原住民主委當選人分別來自於阿美族（所有平地原住民主委）、泰雅族（山原高金素梅）、賽德克族（山原孔文吉）及排灣族（山原簡東明）。如果依據現行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區分，泰雅和賽德克應該被認定為兩個不同族群。但泰雅、賽德克，還有太魯閣等三族原住民，基於語言相似性和紋面文化的關係，傳統上被歸類為泛泰雅族。同時，賽德克族和太魯閣族有親緣關係，是賽德克亞族下的道澤群（Toda）與德奇塔雅群（Tgidaya）（合稱為賽德克族）和太魯閣群（Truku 亦有譯為德魯固群，及現今官方認定的太魯閣族）（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14）。賽德克和太魯閣之所以被認定為兩族，比較多是因為居住區域和在尋求族群身分承認上的步調不一致所造成的。此外，從過去官方認定原住民為九族的時期，到現在十六族時期，賽德克族的孔文吉委員一直被標誌為泰雅族，而其自身也經常以泛泰雅立委自居。有鑒於此，本論文將泰雅、賽德克、太魯閣三族合併歸類為「泛泰雅族」，以便後續分析研究。

理論上來說，阿美族、泛泰雅族、排灣族等三個族群的選民，會因為自身所屬族群有當選立委者，因此比其他族群群的選民更傾向去投票。所以我們將受訪者的族群分成二類：一類是「阿美族、泛泰雅族、排灣族」、另一類則是「其他族群」（包含布農、卑南、魯凱、鄒、賽夏、達悟、邵、噶瑪蘭、撒奇

萊雅、拉阿魯哇、卡那卡那富等11族，共同特徵為沒有自身所屬族群者當選立委)。

2. 政黨認同

此一變數建構所依據的問卷題目為：「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跟台聯，這五個政黨中，請問您認為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詳細數據請下表一)再依據受訪者的答案，將國民黨、親民黨及新黨歸為「認同泛藍」，民進黨及台聯歸為「認同泛綠」，回答都沒有、看情形、不知道歸為「中立」，拒答則歸為遺漏值(詳細數據請見表二)。

表一 政黨認同次數分配

| 政黨認同 | 次數 | 百分比 |
|------|-------|------|
| 國民黨 | 565 | 51.2 |
| 民進黨 | 128 | 11.6 |
| 新黨 | 5 | 0.5 |
| 親民黨 | 67 | 6.1 |
| 台聯 | 1 | 0.1 |
| 中立 | 287 | 26 |
| 無反應 | 49 | 4.5 |
| 總計 | 1,102 | 100 |

資料來源：2013原住民政治態度與行為調查。

表二 藍綠認同次數分配

| 藍綠認同 | 次數 | 百分比 |
|------|-------|------|
| 泛藍 | 637 | 60.5 |
| 泛綠 | 129 | 12.3 |
| 中立 | 287 | 27.2 |
| 總計 | 1,053 | 100 |

資料來源：2013原住民政治態度與行為調查。

過去探討政黨認同與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時，多僅將變數分成「有政黨認同」和「無政黨認同」二類，基本上不考慮政黨之間的差異。然而，在原住民社會當中，如直接套用這種區分，而不區分黨派，恐有混淆的疑慮。既存的原住民政治現實是，在原住民社會當中唯一具備相當組織動員能力的政黨僅有國民黨（海樹兒·戈刺拉菲，2007），且國民黨的動員組織系統已經鑲嵌在原住民一般社會網絡之上，能廣泛且有效地進行選舉動員。至於民進黨和其他政黨，僅能仰賴個別政治人物的個人動員（包正豪，2011；包正豪、謝顯音，2013）。動員程度與深度，不可相提並論。

同時，依表一數據顯示，除國民黨（51.2%）與民進黨（11.6%）兩大黨外，其他各政黨認同之原住民選民均為少數。親民黨認同者約6%，而新黨和台聯則都不到1%（新黨0.5%，而台聯是0.1%）。一般來說，新黨與台聯兩黨基本上不參與原住民選舉政治，而是分別依附國民黨和民進黨，故將其分別與國、民兩黨合併而重新歸類為泛藍和泛綠。至於親民黨認同者雖然有超過6%，應可獨立成一類。但考慮到一方面親民黨的意識型態與國民黨接近，二方面國民黨在提名原住民立委候選人時，是會「禮讓」親民黨一席（平地原住民立委林正二，主要票源範圍在台東縣）的。甚至國民黨原住民地方黨部在選舉動員時，如遇到堅決不願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的泛藍原住民選民，會「建議支持」親民黨候選人（包正豪、謝顯音，2013）。基於上述理由，本文乃將親民黨認同者也歸類為泛藍認同者（藍綠認同者的次數分布，請見表二）。因此，有鑑於政黨的政治動員雖然存在於原住民社會當中，但國民黨（泛藍陣營）的動員能力遠遠高於民進黨（泛綠陣營），所以本研究刻意將此變數分成三個類別：認同泛藍、認同泛綠、中立，以便釐清不同政黨認同 / 聯繫對原住民選舉投票參與的影響。

3. 投票成本 / 距離

誠如前述文獻檢閱所討論的，對多數選民而言，投票成本 / 距離不過是自

家中到投票所的短短幾分鐘路程，以及可能耽擱的有限時間。但就台灣原住民社會經濟發展現況來看，原住民由於原鄉部落就業機會稀少，而有大量向北部都會區遷徙的「島內移民」現象（包正豪、謝顯音，2013）。這些「島內經濟移民」有相當數量並未將戶籍一併遷往北部都會區，所以有很大一部分原住民選民的投票交通成本是遠超過我們一般所想像的。譬如一個戶籍在台東縣海端鄉，但在台北工作的布農族選民，如果要返鄉投票，通常必須提前一天搭車，先到池上再轉其他交通工具回到海端。然後需要花上至少同樣多的時間和金錢，再從海端回到台北工作。換言之，他要花上近2千元的交通支出和耗費整整兩天的時間，就為了投下神聖的一票。這兩者之間的權衡，合理地讓我們相信選民花在投票上的交通成本，是可能會影響到其投票意願的。所以本研究透過詢問選民的戶籍地和居住地，將選民區分成「戶籍地和居住地相同」、「戶籍地和居住地不同，但在同一縣市」、「戶籍地和居住地在不同縣市」等三類受訪者。我們認為當選民的戶籍地和居住地雖然不在同一處，但還是在同一縣市之內的情況下，其投票成本 / 距離不會增加太多，因此本研究將「戶籍地和居住地相同」、「戶籍地和居住地不同，但在同一縣市」合併為「投票成本 / 距離低」，而「戶籍地和居住地在不同縣市」歸類為「投票成本 / 距離高」。

伍、實證分析

為檢證前述「政治賦權」、「政黨認同」、「投票成本 / 距離」等變數對原住民投票參與的影響，本文將先透過交叉分析來觀察主要自變數和依變數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其後再建構統計模型，納入人口社會變數為控制變項，以確定主要自變數和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以下即分別敘述之。

一、政治賦權

表三是原住民族群和投票參與的列聯表。在2008年選舉時，阿美族、泛泰

雅族、排灣族的選民，去投票的比例大約七成（70.4%），高於其他族群投票的比例約八個百分點，同時藉由卡方檢定與線性關係檢定發現，在95%的信心水準下，不同族群選民的投票參與並未呈現顯著差異。但由表三的數據來看， p 值為.065，已經非常接近顯著差異的門檻。若將信心水準放寬到90%，政治賦權對2008年的投票參與是具有影響力的。等到2012年選舉的時候，雖然阿美族、泛泰雅族、排灣族的投票比例（63.2%）還是略高於其他族群（60.5%），但卡方檢定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因此政治賦權對2012年選舉不同原住民族選民的投票參與上，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此點發現與包正豪（2013）使用總體選舉結果資料所作分析之發現一致，均觀察到2008年立委選舉時，阿美族、泛泰雅族、排灣族的原住民選民顯著傾向前往投票，而其他族群原住民選民則否，而2012年立委選舉則是兩者之間無顯著差異。但本文使用個體層次調查資料所得到的分析結果提供我們更進一步的訊息。就表三數據可以發現，雖然自卡方檢定與線性關係檢定結果來看，2012年選舉時，兩類選民的投票參與沒有顯著差異，但仍可觀察到自身所屬族群有當選立委者的投票參與程度高過自身所屬族群沒有當選立委者。只是這個差異尚未大到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而已。因此，考慮到2012年的立委和總統選舉合併投票，將過往普遍偏低的原住民立委選舉投票率，從2008年42.9%（平地原住民）和51.6%（山地原住民），拉高到2012年的58.7%和65.1%。在這樣的情形下，仍可觀察到阿美族、泛泰雅族、排灣族的選民去投票的比例高於其他族群的現象（縱使差異沒有大到具備統計顯著性），我們似可合理推論政治賦權確實會對投票參與行為產生影響。2012的「沒有顯著差異」應為其他因素干擾的結果。

表四則顯示原住民的政黨認同和其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在2008年的投票參與方面，認同泛藍的原住民選民中，有高達78.5%選擇去投票，認同泛綠的選民中，則有大約三分之二（66.7%）去投票，至於在政黨認同中保持中立的選民，則較為傾向不去投票，其比例為55.5%。在2012年方面，認同泛藍者

表三 原住民選民族群和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

| | 2008 | | | 2012 | |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 選 民 族 群 | 阿美、泛泰雅、 排灣 | 149 (29.6%) | 354 (70.4%) | 503 (100.0%) | 235 (36.8%) | 404 (63.2%) | 639 (100.0%) |
| | 其他族群 | 55 (37.7%) | 91 (62.3%) | 146 (100.0%) | 70 (39.5%) | 107 (60.5%) | 177 (100.0%) |
| | 合計 | 204 (31.4%) | 445 (68.6%) | 649 (100.0%) | 204 (37.4%) | 511 (62.6%) | 816 (100.0%) |
| 卡方檢定 | $X^2=3.401, df=1, p>.05$ ($p=0.065$) | | | $X^2=0.455, df=1, p>.05$ | | | |

資料來源：2013原住民政治態度與行為調查。
說明：（）內的數值代表橫列百分比。

有七成三左右（73.4%）的比例去投票，泛綠認同者去投票的比例依舊少於泛藍認同者，大約六成左右（59.4%），中立認同者在該次選舉中則有高達六成（60.5%）的比例選擇缺席。二個年度的卡方檢定都顯示政黨認同和投票參與

表四 原住民選民政黨認同和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

| | 2008 | | | 2012 | |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 政 黨 認 同 | 泛藍 | 88 (21.5%) | 322 (78.5%) | 410 (100.0%) | 128 (26.6%) | 354 (73.4%) | 482 (100.0%) |
| | 泛綠 | 23 (33.3%) | 46 (66.7%) | 69 (100.0%) | 39 (40.6%) | 57 (59.4%) | 96 (100.0%) |
| | 中立 | 86 (55.5%) | 69 (44.5%) | 155 (100.0%) | 130 (60.5%) | 85 (39.5%) | 215 (100.0%) |
| | 合計 | 197 (31.1%) | 437 (68.9%) | 634 (100.0%) | 297 (37.5%) | 496 (62.5%) | 793 (100.0%) |
| 卡方檢定 | $X^2=60.967, df=2, p<.001$ | | | $X^2=73.447, df=2, p<.001$ | | | |

資料來源：2013原住民政治態度與行為調查。
說明：（）內的數值代表橫列百分比。

之間有顯著的關聯性，同時從橫列百分比也可以呼應我們前面段落對於政黨認同的假設，認同泛藍者或許因為政黨動員力道較強，比泛綠認同者更傾向去投票，而最不願意去投票的，還是沒有特定政黨認同的選民。

從表五的數據可以看出投票成本 / 距離是否對於原住民投票參與有顯著的影響。不管是從橫列百分比來看，或是從卡方檢定值來看，選民並不會因為投票成本 / 距離高（戶籍地和居住地不在同一縣市）或投票成本 / 距離低（戶籍地和居住地相同、戶籍地和居住地不同，但位於同一縣市）而在投票參與上有顯著的差異。初步看來，似乎與理論預期不符。

綜觀以上前述分析結果，政治賦權和政黨認同二者與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與本文研究假設似乎契合，但投票成本 / 距離則否。但以上交叉分析只是初步呈現兩兩變數之間的關係，我們仍然必須加入其他對於原住民投票參與可能具有影響力的變數來建立一個較為完整的統計分析模型，以確定這幾個主要自變數和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本文所使用之統計分析模型，依變數為投票參與，為原住民選民在2008和2012立委選舉中的投票情形，各自區分為「投票」和「未投票」兩類，以「未投票」為參照組。由於依變數為「二元類別

表五 原住民選民投票成本 / 距離和投票參與之交叉分析

| | | 2008 | | | 2012 | | |
|---------------------|---|------------------------------------|----------------|-----------------|------------------------------------|----------------|-----------------|
| |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未投票 | 投票 | 合計 |
| 投票 成本 / 距離 | 高 | 32 (34.4%) | 61 (65.6%) | 93 (100.0%) | 43 (37.7%) | 71 (62.3%) | 114 (100.0%) |
| | 低 | 175 (31.4%) | 383 (68.6%) | 558 (100.0%) | 267 (37.8%) | 440 (62.2%) | 707 (100.0%) |
| 合計 | | 207 (31.8%) | 444 (68.2%) | 651 (100.0%) | 310 (37.8%) | 511 (62.2%) | 821 (100.0%) |
| 卡方檢定 | | X ² =0.341, df=1, p>.05 | | | X ² =0.000, df=1, p>.05 | | |

資料來源：2013原住民政治態度與行為調查。

說明：（）內的數值代表橫列百分比。

變數」，故本文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模型將為「二元勝算對數模型」。自變數方面，則建構除前述主要自變數：政治賦權、政黨認同、投票成本 / 距離之外，還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職業等控制變數。同時也將原住民社會當中，除政黨以外，另一理論上對原住民政治生活有影響的社會組織：基督教會，納入前述分析模型當中。所有自變數的次數分配表請詳見附錄一表A。同時，為更加詳細詮釋模型統計係數分析結果，將輔以部份總體資料分析。

為便於比較兩次選舉中各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本文將2008和2012兩組二元勝算對數模型的統計分析結果，合併於表六呈現。兩組模型的「準決定係數」(pseudo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pseudo R^2)分別為0.308 (2008模型) 和0.284 (2012模型)，意指本文所使用之統計分析模型可分別解釋30.8% (2008模型) 和28.4% (2012模型) 的投票參與變異量。此一變異量解釋水準，以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研究來說，應可認定納入統計分析模型的自變數群對於依變數有相當程度的解釋預測能力。

根據表六的數據顯示，整體來說，就2008年選舉的情形而言，政治賦權、政黨認同、年齡、職業，以及是否具備基督信仰等變數是解釋原住民投票參與與否的重要解釋項。但投票成本 / 距離、性別、教育程度等，則均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這些因素對原住民選民的投票參與並無顯著影響。其次，就2012年選舉的情形來看，這些原先在2008年選舉當中無顯著影響的變數，在2012年選舉當中還是不顯著。所以大致可以確認投票成本 / 距離、性別、教育程度等變數對於原住民投票參與的影響有限，甚至無關。至於原先2008年選舉當中有顯著影響的政治賦權和職業等兩個變數，在2012年選舉時，並未觀察到同樣的顯著情形。只有政黨認同和基督信仰兩個變數依然維持其對於原住民投票參與的顯著影響力。雖然兩個年度模型的解釋變異量差異不大，均為30%左右 (2008年模型的解釋變異量 [30.8%] 較2012年 [28.4%] 高出2.4%)，但鑒於兩個年度顯著影響因素的差異，以下分析將首先討論政黨認同和基督信仰對原住民投票參與的影響，其後討論何以政治賦權會在2008發揮影響力卻於2012

表六 二元勝算對數模型分析

| | 2008 | | | 2012 | | |
|---------------------|--------------|---------|----------------|--------------|---------|----------------|
| | 投票=1 / 未投票=0 | | | 投票=1 / 未投票=0 | | |
| | β | (s.e.) | Exp(β) | β | (s.e.) | Exp(β) |
| 政治賦權 (其他族群群=0) | | | | | | |
| 阿美族+泛泰雅族+ 排灣族 | .481* | (0.243) | 1.617 | .128 | (0.211) | 1.137 |
| 政黨認同 (中立=0) | | | | | | |
| 泛藍 | 1.563*** | (0.231) | 4.775 | 1.334*** | (0.192) | 3.796 |
| 泛綠 | 1.244*** | (0.349) | 3.470 | 0.835** | (0.279) | 2.305 |
| 投票成本 / 距離 (高=0) | | | | | | |
| 低 | -.256 | (0.289) | 0.774 | -.405 | (0.245) | 0.667 |
| 性別 (女性=0) | | | | | | |
| 男性 | .136 | (0.215) | 1.146 | .009 | (0.178) | 1.009 |
| 年齡 (55歲以上=0) | | | | | | |
| 20-39歲 | -2.020*** | (0.372) | 0.133 | -1.859*** | (0.310) | 0.156 |
| 40-54歲 | -.964 | (0.350) | 0.381 | -1.049** | (0.303) | 0.350 |
| 教育程度 (大專及以上=0) | | | | | | |
| 小學及以下 | -.268 | (0.408) | 0.765 | .359 | (0.335) | 1.432 |
| 國高中 | -.142 | (0.292) | 0.868 | .540* | (0.227) | 1.715 |
| 職業 (家庭主婦、學生、無業=0) | | | | | | |
| 軍公教+中高階白領 | .333 | (0.427) | 1.395 | .176 | (0.316) | 1.193 |
| 低階白領 | -1.059* | (0.428) | 0.347 | -.065 | (0.348) | 0.937 |
| 藍領 | -.662** | (0.257) | 0.516 | -.075 | (0.205) | 0.928 |
| 宗教信仰 (其他或無信仰=0) | | | | | | |
| 基督教信仰 | .772*** | (0.216) | 2.164 | .950*** | (0.183) | 2.585 |
| 常數 | 2.033** | (0.662) | | .989 | (0.519) | |
| 模型資訊 | | | | | | |
| Nagelkerke R-square | | 0.308 | | | 0.284 | |
| n | | 617 | | | 776 | |

資料來源：2013原住民政治態度與行為調查。

不顯著。最後則分析投票成本 / 距離何以未若理論預期地對原住民投票參與產生顯著影響，並討論其與職業變數之間的關係。

過往使用質性方法所進行的研究指出，原住民社會當中的選舉動員是以社會關係網絡為核心的動員方式，首重血緣關係，其次是族群關係，然後地緣關係。在這個關係網絡之外（或可稱為與之重疊但範圍更廣的關係網絡）的選舉動員，則是仰賴政黨，特別是國民黨（包正豪、謝顯音，2013）。因此，本文的研究發現提供了實證證據來支持前述質性研究的結論。本文發現，在政黨認同方面，認同泛藍或認同泛綠的原住民選民，不管在2008年或2012年，都比中立認同者要更傾向參與投票，且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在2008年的選舉中，泛藍認同者去投票相對於不投票的機率比，是中立認同者的4.775倍，而泛綠認同者去投票相對於不投票的機率比，則是中立認同者的3.74倍；在2012年時，從投票相對於不投票的機率比來看，泛藍認同者是中立認同者的3.796倍，泛綠認同者則是中立認同者的2.305倍，顯見泛藍認同者有更高的機率去投票，也驗證了政黨認同影響投票參與的假設。^⑩

在原住民社會當中另一個有影響力的「組織」是基督教會。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數據請見表七），原住民受訪者當中有接近七成（68.2%）是基督徒，而分屬不同教會。其中教友人數較多的有基督教長老教會（29.2%）、天主教會（22.9%），以及基督教真耶穌教會（6.2%）。其他各小型教會教友則占所有選民數的10%。而在原住民社會當中，無論是在原鄉部落或是都會中的原住民聚集區，每個部落 / 社區一定會有至少一個以上的基督教會。教會裡的神父、牧師、執事也必然是該部落 / 社區當中的重要意見領袖，對部落 / 社區公共事務有相當影響力與發言權。雖然基督教會對原住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尚未有

^⑩ 當我們將參照類改為泛綠認同時，泛藍認同者的係數在2008年為0.319，在2012年為0.499，雖然係數值為正，代表泛藍認同者相對於泛綠認同者更傾向去投票，但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因此嚴格來說，我們並不能很肯定的說，泛藍認同者一定比泛綠認同者更傾向去投票，不過既然二個年度的係數都為正，大致上應該是有這樣的趨勢。

實證研究討論，但從社區總體營造相關研究結果可以了解，基督教會對部落與社區內的公共事務是有相當影響力的（包正豪，2009, 2012）。因此，當天主教會的神父和基督教會的牧師、執事等開始在部落 / 社區鼓勵踴躍投票時，因為不涉及支持對象，只是鼓勵投票。就以日常生活高度受到教會影響的原住民教友們而言，是不需要擔心自身支持對象可能與教會不符合的問題，而會是一個「蒙神喜悅」的作為。

表七 原住民宗教信仰次數分配

| 宗教信仰 | 次數分配 | 百分比 |
|----------|-------|------|
| 沒有 | 177 | 16.2 |
| 佛教 | 96 | 8.8 |
| 道教 | 74 | 6.8 |
| 天主教 | 250 | 22.9 |
| 基督教長老教會 | 319 | 29.2 |
| 基督教真耶穌教會 | 67 | 6.2 |
| 基督教其他教派 | 110 | 10.0 |
| 總計 | 1,092 | 100 |

資料來源：2013原住民政治態度與行為調查。

基督教會在2012年以前，僅有基督教長老教會每次選舉都會呼籲原住民選民前往投票。而根據本文研究發現，在2008年選舉時，具有基督教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各教派）的選民，相對於沒有宗教信仰或是佛、道教信仰的選民更傾向去投票，其投票和不投票的機率比，是沒有宗教信仰或信仰佛、道教的選民的2.164倍。而在2012年，這個傾向被進一步強化。當年基督教長老教會和天主教會負責原住民牧靈事務的高層領袖聯袂召開記者會，公開呼籲原住民選民要踴躍投票。是年（2012），具有基督教信仰的選民，其投票和不投票的機率比，是沒有宗教信仰或信仰佛、道教的選民的2.585倍。其影響程度高過2008年只有基督教長老教會從事動員時。因此，就以上實證證據和相關討論，基督教

會的動員為原住民投票參與的顯著影響因素之一，應無疑問。

政治賦權對原住民投票參與的影響，在兩個選舉年度是不一致的。2008年模型當中政治賦權變數對投票參與的影響，其係數值為正，代表相對於參照類的其他族群群，阿美族、泛泰雅族和排灣族的選民較傾向去投票，若轉換為去投票相對於未投票的機率比（odds）來解釋，阿美族、泛泰雅族和排灣族是其他族群群的1.617倍，而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是2012年模型當中，政治賦權的係數一樣為正，代表擁有立委的族群之選民較傾向去投票，但針對係數值的檢定，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因此，初步來看，政治賦權對投票參與的影響並不穩定。

如我們進一步解讀上述統計係數所代表的意涵，可以發現2012年模型統計係數雖然未達顯著水準，但在方向上是與2008年模型一致的。重新檢視2008和2012兩次選舉，其中最明顯的差異是前者是單獨投票，後者則是與總統選舉合併辦理投票。合併選舉對投票率的影響是，將以往偏低的原住民立委投票率平均拉高15%（平地和山地原住民合併計算）。但除了投票率的大幅度變動外，2008與2012選舉其實並沒有太多變化。表八是2008與2012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結果，2008年共有5人參選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而2012年則倍增為10人。看似選舉競爭激烈，但若以得票率標準差做為選舉競爭激烈程度的指標，^① 我們可以發現2008與2012兩次選舉的差異並沒有想像中大。2008年全體平地原住民選舉候選人的得票率標準差是8.62%，若只考慮得票率超過10%者（同時也是應選三席的前四名競爭者），則標準差為6.78%。依同樣標準檢視2012年選舉結果，標準差則分別為9.44%和7.91%，各自約上升1%左右。類似情形在山地原住民立委選舉部分也被觀察到。根據表九數據顯示，2008有7位候選人，但2012略減為6人。全體標準差分別為12.07%和10.57%，而得票率超過10%者的標準差是4.62%和6.26%，大約各自下降約1.5%左右。所以就以上數據，我們大

^① 候選人得票率的標準差愈小，表示得票率愈接近，意味著選舉競爭愈激烈。

致可以解讀2008和2012的平地原住民選舉之選舉競爭激烈程度微幅下降，而山地原住民選舉則是微幅上升，而整體差異有限。

其次，我們比較兩次選舉當中的有競爭力參選人。2008當選平地原住民立委者有廖國棟、楊仁福、林正二，而2012年則是由鄭天財取代楊仁福，而其他人不變。楊仁福2012並未參選，而是輔選他的外甥鄭天財。而根據包正豪（2011）的研究，鄭天財有效地接收楊仁福過去的穩定票源。至於得票排名第四的候選人則分別是2008的宋進財和2012洪國治。這兩人也沒有同時參選，而且共同背景都是台北縣 / 新北市平地原住民議員，也都是無黨籍身分參選。至於山地原住民部分，兩次選舉的當選人完全一樣，分別是簡東明、孔文吉、高金素梅。有力競爭者的第四名都是親民黨籍，分別是2008的林春德和2012的瓦歷斯·貝林。同樣地，林春德和瓦歷斯·貝林也沒有同時參選，而且兩人都是泛泰雅族人。

根據上述討論分析，我們可以發現2008與2012年兩次選舉的選舉競爭程度差異很小，主要參與選舉的候選人也幾乎完全一致，而唯一的差異就在於2008是單獨選舉而2012是合併總統選舉投票。所以2012選舉所提高的15%投票參與率應是造成當年政治賦權因素不顯著的主因。其理由在於，當立委與總統選舉合併辦理並同時投票時，因為總統選舉的高度受到矚目而政黨全力動員的附帶效應，使原本較不願意出來投票的其他族群原住民選民也被動員出來投票，進而稀釋了政治賦權因素對投票參與的影響程度，而致使政治賦權對投票參與在2008有顯著影響，而2012僅具備正向關係但影響不顯著的結果。因此，政治賦權應仍為影響原住民投票參與的重要因素，只是未若政黨認同和基督信仰般穩定，而可能會受到選舉制度安排（是否與其他選舉合併辦理）的影響。

至於投票成本 / 距離方面，統計模型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2008或2012，雖然都呈現負向關係（ β 值分別為-0.256和-0.405），表示投票成本 / 距離愈高者，愈傾向不去投票。但這個負向關係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意指投票成本 / 距離和投票參與之間的關係並不顯著。換言之，就台灣的個案而言，原

表八 2008與2012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結果

| 2008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結果 | | | | 2012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結果 | | | |
|-----------------|------|--------|--------|-----------------|------|--------|--------|
| 姓名 | 推薦政黨 | 得票數 | 得票率 | 姓名 | 推薦政黨 | 得票數 | 得票率 |
| 廖國棟 | 國民黨 | 20,156 | 30.76% | 廖國棟 | 國民黨 | 26,998 | 27.51% |
| 楊仁福 | 國民黨 | 17,069 | 26.05% | 鄭天財 | 國民黨 | 23,480 | 23.92% |
| 林正二 | 親民黨 | 11,925 | 18.19% | 林正二 | 親民黨 | 13,992 | 14.25% |
| 宋進財 | 無黨籍 | 10,662 | 16.27% | 洪國治 | 無黨籍 | 10,524 | 10.72% |
| 陳秀惠 | 民進黨 | 5,710 | 8.71% | 笛布斯·顛賚 | 無黨籍 | 8,841 | 9.00% |
| | | | | 忠仁·達祿斯 | 無黨籍 | 6,757 | 6.88% |
| | | | | 馬躍·比吼 | 無黨籍 | 4,553 | 4.63% |
| | | | | 詹金福 | 無黨籍 | 1,294 | 1.31% |
| | | | | 陳連順 | 其他政黨 | 986 | 1.00% |
| | | | | 林金瑛 | 其他政黨 | 706 | 0.71% |
| 全體標準差 | | | 8.62% | 全體標準差 | | | 9.44% |
| 得票率超過10%者標準差 | | | 6.78% | 得票率超過10%者標準差 | | | 7.91% |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標準差部分由筆者自行計算）。

表九 2008與2012山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結果

| 2008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結果 | | | | 2012平地原住民立委選舉結果 | | | |
|-----------------|--------|--------|--------|-----------------|--------|--------|--------|
| 姓名 | 推薦政黨 | 得票數 | 得票率 | 姓名 | 推薦政黨 | 得票數 | 得票率 |
| 簡東明 | 國民黨 | 22,659 | 26.86% | 簡東明 | 國民黨 | 28,581 | 24.48% |
| 孔文吉 | 國民黨 | 22,391 | 26.54% | 孔文吉 | 國民黨 | 31,629 | 27.10% |
| 高金素梅 | 無黨團結聯盟 | 20,012 | 23.72% | 高金素梅 | 無黨團結聯盟 | 29,520 | 25.29% |
| 林春德 | 親民黨 | 14,265 | 16.91% | 瓦歷斯·貝林 | 親民黨 | 15,533 | 13.30% |
| 侯金助 | 民進黨 | 4,420 | 5.23% | 曾智勇 | 民進黨 | 9,968 | 8.54% |
| 薛宜蓁 | 其他政黨 | 443 | 0.52% | 邱文生 | 無黨籍 | 1,481 | 1.26% |
| 宋仁和 | 其他政黨 | 168 | 0.19% | | | | |
| 全體標準差 | | | 12.07% | 全體標準差 | | | 10.57% |
| 得票率超過10%者標準差 | | | 4.62% | 得票率超過10%者標準差 | | | 6.26% |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標準差部分由筆者自行計算）。

住民投票率低落的原因，應非單純是旅居在外的族人因為「投票成本 / 距離」考量而不返鄉投票造成的。社會傳統觀點未獲實證證據支持。所謂「投票成本 / 距離」理論，或有修正必要，未能直接援引而用來解釋台灣原住民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爲。

所謂「投票成本 / 距離」，其實是個別選民的感受問題。每個選民對「投票成本 / 距離」大小高低的感覺，其實都是很主觀的。特別是不同經濟階級的選民對相同投票成本 / 距離恐怕會有不同的感受。譬如一個有穩定中高收入的公教人員和同部落出身但是在打零工的藍領勞工，兩者對從都會區返回原鄉部落投票所必須支出的金錢和時間成本，感受差異應該很大。換言之，投票成本 / 距離是表象，背後隱含的是經濟階級問題。事實上，就表六的數據顯示，2008年職業變數對投票參與的影響是顯著的。相較於家庭主婦、學生及退休無業者（參考組），軍公教與中高階白領者去投票相對於不去投票的機率，是前者的1.395倍。低階白領和藍領勞工則更爲顯著，其去投票相對於不去投票的機率，是參考組的0.347和0.516倍。也就是說，相較於家庭主婦、學生及退休無業者，低階白領和藍領勞工更傾向不去投票，而藍領勞工又更甚之。

至於2012年模型，職業變數對於投票參與的影響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但影響方向卻是一致的。同樣以家庭主婦、學生及退休無業者爲參考組，依然是軍公教和中高階白領比較傾向去投票，低階白領和藍領勞工比較不願意前往投票。這點發現與早期採取資源模型的「社會人口因素」（socio-demographic factor）觀點出發之相關研究結論契合，認爲少數族群的低度政治參與肇因於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Verba and Nie, 1972; Welch and Foster, 1992）。

而造成2008和2012兩次選舉當中，職業變數對投票行爲影響顯著程度有差異的原因，本文以爲仍是合併選舉而因爲總統選舉的高度受到矚目，同時政黨又全力動員的附帶效應，使原本較不願意出來投票的原住民選民也被動員出來投票，進而稀釋了職業因素對投票參與的影響程度，而致使職業對投票參與在2008有顯著影響，而2012僅具備正向關係但影響不顯著的結果。因此，職業

(反應社會經濟地位)應仍為影響原住民投票參與的重要因素，但與政治賦權因素相類似，未若政黨認同和基督信仰般穩定，而會受到選舉制度安排的影響。

至於其他控制變數對於投票參與的影響方面，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年齡變數。年齡層方面，20到39歲的原住民相對於年長者（55歲以上）較不願意去投票，且在二個年度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40到54歲的選民相對於55歲以上的選民，也是比較傾向不去投票，只是在2008年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¹² 換言之，愈是年輕的原住民選民愈傾向不去投票，而年齡已達退休年齡的原住民選民則是主要投票主力。

伍、結論

原住民投票參與程度低落問題，早為社會所熟知。但由於學界疏於探究原因，致使我們對原住民投票參與行為的認識，普遍停留在臆測或想當然爾的階段，而未有相對應的做法來消弭原漢之間的投票參與差異。本篇論文，作為國內學界第一篇以量化實證研究方法探討原住民投票參與行為的研究，將有助於增進我們對原住民投票行為的認識，並為未來相關研究奠定理論基礎。本文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受到政黨與教會組織動員，以及政治賦權和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

政黨與教會組織的選舉動員是有效的且不受是否合併選舉的影響。換言之，是強有力的影響因素。本文研究結果顯示，有政黨認同的原住民選民的投票參與意願較無政黨認同者來得高，而泛藍政黨認同者又高過泛綠政黨認同

¹² 一般對於年齡層的分類方式，若僅是簡單區分成三類，會使用20-39歲（年輕人）、40到59歲（中年人）、60歲以上（老年人）這三類。但本研究考慮到原住民的退休年齡，將55歲以上就歸類為年長者。

者。泛綠政黨認同之原住民選民的投票參與意願相對較低的可能因素，一方面在於泛綠政黨候選人當選機率較低，支持者因而認為投票效用較低，所以較不願去投票；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泛綠政黨候選人當選機率較低，所以相關政黨並未積極經營原住民選區，並建構具能量的動員組織。因此，我們可以預見如果原住民政治的變異性提高，泛綠政黨的原住民基層組織能夠強化，將有助於提升整體原住民投票參與的意願。

至於基督教會對原住民投票參與的顯著影響，則彰顯基督教會在原住民社會當中的重要影響力。2012年選舉以前，只有基督教長老教會單打獨鬥地呼籲並動員原住民選民投票。但2012年總統與立委合併選舉時，在原住民社會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原住民牧靈委員會」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打破宗派的隔閡，共同召開記者會，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原住民積極參與投票。統計分析數據顯示，此一行動是有效的，具有基督信仰的原住民選民的投票參與的機率較無基督信仰者高出2.5倍以上，高過2008年的2.2倍。因此，未來如果能夠更進一步打破宗派隔閡，讓在原住民社會當中亦有相當可觀數量教友的「真耶穌教會」也願意共同加入，我們可以預期透過教會系統的宣導與推動，應能更為有效地提高原住民的投票參與意願。

其次，由於選舉制度設計，使得人口規模較大的原住民族，如阿美、泛泰雅、排灣等較易當選政治職位，而長期由大族宰制政治資源的現實，使得其他人口規模較小的族群選民較不願參與投票。政治賦權現象極為明顯。不過，透過與總統選舉合併舉辦的方式，確實能有效拉高原住民選民的投票參與程度，進而模糊化政治賦權的影響，但族群差異依然存在。換言之，政治賦權現象的結構性差異是無法藉由合併選舉而消弭的，現行原住民政治代表的產生方式如果不予以改變，我們可以預期原住民社會應將會有依據次族群區分而產生兩極化的政治參與現象出現。

至於投票成本 / 距離對投票參與行為的影響不顯著，則顯示傳統上認為「原住民因為離鄉背井到都會區工作，返鄉距離遙遠，投票成本 / 距離偏

高」，導致投票意願低落的說法，並未受到實證證據支持。也就是說，距離遠近並非影響原住民選民投票不投票的因素。然而我們發現2008年的數據顯示，低階白領和藍領階級工作的原住民選民，是顯著比較不願意投票的。雖然在2012的數據當中，此一對應關係可能因為總統、立委合併選舉拉高投票率，導致在統計上較不顯著，但低階白領和藍領階級等工作之原住民選民仍傾向較不願意去投票。換言之，投票成本 / 距離對投票參與行為的影響是可能存在的。只是投票成本 / 距離之高低是個人主觀認定的。社會經濟階級較低者相對於經濟階級較高者，在面對同樣的金錢與時間成本時，感受會比較深，而認為投票的成本較高而不願意去投票。因此，未來若能推動不在籍投票制度，應能有效降低較低社會經濟階級原住民選民的心理投票成本，繼而提升其投票意願。

原住民選民投票參與較漢人選民為低，不僅造成原住民族同胞對國家 / 政府歸屬感的日漸疏離，也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隱憂。因此，如何透過實證研究分析，釐清在現狀之下原住民選民之所以較不願意投票的原因，繼而採取相應改善手段，即為重要議題。本文透過個體層次的調查資料分析，輔以選舉結果總體資料的佐證，釐清影響原住民選民投票參與的主要影響因素，分別為政黨認同與基督信仰、政治賦權、職業，也證明社會傳統觀點所謂「原住民多在北部都會區工作，距離太遠而不願意返鄉投票」係為誤解，其背後影響的因素還是經濟差異的問題。這些研究發現能增進我們對原住民投票參與行為的認識，並以為未來相類似研究的討論基礎。

附錄一

表A 各變數之次數分配表

| 變數名稱 | | 次數 | 百分比 |
|--------------|--------------|-----|------|
| 2008 投票參與 | 投票 | 445 | 68.1 |
| | 未投票 | 209 | 31.9 |
| 2012 投票參與 | 投票 | 511 | 62.2 |
| | 未投票 | 311 | 37.8 |
| 政治賦權 | 阿美族、泛泰雅族、排灣族 | 831 | 76.6 |
| | 其他族群 | 254 | 23.4 |
| 政黨認同 | 認同泛藍 | 637 | 57.8 |
| | 認同泛綠 | 129 | 11.7 |
| | 中立 | 287 | 26.0 |
| 投票成本 / 距離 | 低 | 951 | 86.9 |
| | 高 | 144 | 13.1 |
| 性別 | 男 | 526 | 47.7 |
| | 女 | 576 | 52.3 |
| 年齡 | 20-39歲 | 502 | 46.4 |
| | 40-54歲 | 337 | 31.2 |
| | 55歲以上 | 243 | 22.4 |
| 教育程度 | 小學及以下 | 240 | 21.8 |
| | 國高中 | 623 | 56.6 |
| | 大專及以上 | 237 | 21.5 |
| 職業 | 軍公教、中高階白領 | 128 | 11.8 |
| | 低階白領 | 71 | 6.5 |
| | 藍領 | 497 | 45.6 |
| | 家庭主婦、學生、無業 | 393 | 36.1 |
| 宗教信仰 | 基督教信仰 | 745 | 67.6 |
| | 其他宗教或無信仰 | 347 | 31.5 |

資料來源：2013原住民政治態度與行為調查。

參考書目

- 包正豪（2009）。〈原住民部落觀光發展的困境與策略：宜蘭縣南澳鄉金洋及武塔部落個案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2卷，第4期，頁87-109。
- (Cheng-hao Pao [2009]. "The Plight and Strategy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King-Young and Utaes Communities." *Taiw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Studies*, Vol. 2, No. 4:87-109.)
- _____（2011）。〈原住民政治版圖的持續與變遷：1992-2008立委選舉的總體資料分析〉，《選舉研究》，第18卷，第2期，頁87-120。
- (_____ [2011]. "The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Aboriginal Electoral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the aggregate data of indigenous legislative election results (1992-2008)."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Vol. 18, No. 2:87-120.)
- _____（2012）。〈原鄉的基層社區治理：宜蘭縣南澳鄉K村個案研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5卷，第1期，頁73-98。
- (_____ [2012]. "Indigenous Community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K." *Taiw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Studies*, Vol. 5, No. 1:73-98.)
- _____（2013）。〈選舉競爭、政治賦權與原住民投票參與：2008與2012立委選舉的總體資料分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6卷，第4期，頁77-117。
- (_____ [2013]. "Election Closeness, Political Empowerment, and Aboriginal Voting Participation: An Aggregate-Level Analysis of the 2008 and 2012 Legislator Elections." *Taiw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Studies*, Vol. 6, No. 4:77-117.)
- 包正豪、周應龍（2014）。〈以電訪樣本資料庫作為解決原住民調查研究難題之可行性的再討論〉，《選舉研究》，第21卷，第2期，頁147-75。
- (Cheng-hao Pao and Ying-lung Chou [2014]. "Using Telephone Survey Sample Data as a Feasible Resolution to the Difficulty of Indigenous Survey."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Vol. 21, No. 2:147-75.)
- 包正豪、謝顯音（2013）。〈國民黨的原住民選舉動員：一個社會文化互動途徑的初探分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6卷，第2期，頁83-137。
- (Cheng-hao Pao and Haoyin Ivy Hsieh [2013]. "Indigenous Electoral Mobil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aiw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Studies*, Vol. 6, No. 2:83-137.)
- 吳俊德、陳永福（2005）。〈投票與不投票的抉擇—2004年總統大選與公民投票的探索性研究〉，《臺灣民主季刊》，第2卷，第4期，頁67-98。
- (Jun-deh Wu and Alexander C. Tan [2005]. "To Vote or Not to Vote, That is the Question: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Presidential and Referenda Vote in Taiwa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Vol. 2, No. 4:67-98.)

- 吳重禮、李世宏 (2005)。〈政治賦權、族群團體與政治參與：2001年縣市長選舉客家族群的政治信任與投票參與〉，《選舉研究》，第12卷，第1期，頁69-115。
- (Chung-li Wu and Shih-hung Lee [2005]. "Political Empowerment, Ethnic Group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Trust and Voting Participation of the Hakkas in the 2001 County Magistrate/City Mayoral Elections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Vol. 12, No. 1:69-115.)
- 黃紀、林長志 (2013)。〈併選對投票率的影響：因果效應分析〉，陳陸輝 (主編)，《2012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一變遷與延續》，頁47-84。台北：五南。
- (Huang, Chi and Chang-chih Lin [2013]. "Electoral Cycles: Concurrent Elections and Voter Turnout." In Lu-huei Chen [ed.], *Election of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or in 2012: Transition and Continuity* [pp. 47-84]. Taipei: Wu-Nan.)
- 海樹兒·友刺拉菲 (2007)。《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 (Haisul, Palalavi [2007]. *A Study on Indigenous Legislators' Campaign Behavior*.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 傅仰止、簡文吟、伊慶春 (2001)。〈電訪樣本資料庫的再利用：以社會意向原住民專題調查為例〉，《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9期，頁109-18。
- (Yang-chih Fu, Wen-yin Chien, and Chin-chun Yi [2001]. "The Reuse of Telephone Interview Sample Database: The Case of Social Image Indigenous Special Survey." *Survey Research: Method and Application*, No. 9:109-18.)
- 廖益興 (2006)。〈台灣選民投票參與行為的研究〉，《中華行政學報》，第3期，頁185-202。
- (Yih-hsing Liao [2006]. "The Research of Voter Turnout: Case Study of Taiwa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 3:185-202.)
-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14)。〈泰雅族、太魯閣族文面文化—族稱〉，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網站。<http://www.dmtip.gov.tw/event/fas/htm/02name/02name.htm>。2014/12/31。
-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2014]. "Culture of Facial Tattoo, Atayal and Truku." *Digital Museum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http://www.dmtip.gov.tw/event/fas/htm/02name/02name.htm> [accessed December 31, 2014].)
- Abramson, Paul R. (1983).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n: Formation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Press.
- Ashenfelter, Orley and Stanley Kelly, Jr. (1975). "Determinants of Participation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Journal of Laws and Economics*, Vol. 18, No. 3:695-733.
- Aldrich, John H. (1993). "Rational Choice and Turnou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7, No. 1:246-78.
- Banducci, Susan A., Todd Donovan, and Jeffery A. Karp (2004). "Minority Representation,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534-56.

- Bhatti, Yosef (2012). "Distance and Voting: Evidence from Danish Municipalities."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2:141-58.
- Blais, André (2007). "Turnout in Elections." In Russell J. Dalto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pp. 621-3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bo, Lawrence and Franklin D. Gilliam, Jr. (1990). "Race,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Black Empower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 2:377-94.
- Brady, Henry E. and John E. McNulty (2011). "Turning Out to Vote: The Costs of Finding and Getting to the Polling Pl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5, No. 1:115-34.
- Brouard, Sylvain and Vincent Tiberj (2011). "Yes they can: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the eligibility of ethnic minority candidates in France." In Karen Bird, Thomas Saalfeld, and Andreas M. Wüst (eds.),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Voters, parties and parliament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pp. 164-80). London: Routledge.
-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E.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Row, Peterson.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 Cassel, Carol A. and David B. Hill (1981). "Explanation of Turnout Decline."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Vol. 9, No. 2:181-95.
- Cohen, Jeffrey E. and Ken Collier (1999). "Public opinion: Reconceptualizing going public." In Steven A. Shull (ed.), *Presidential policymaking: An end-of-century assessment* (pp. 41-58). Armonk, NY: M. E. Sharpe.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Dyck, Joshua J. and James G. Gimpel (2005). "Distance, Turnout, and the Convenience of Voting."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6, No. 3:531-48.
- Ferejohn, John A. and Morris P. Fiorina (1974). "The Paradox of Not Voting: A Decision Theoretic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8, No. 2:525-36.
- Frey, Bruno S. (1971). "Why Do High Income People Participate More In Politics?" *Public Choice*, Vol. 11, No. 1:101-5.
- Gay, Claudine (2001). "The Effect of Black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3:589-602.
- Gilliam, Frank D., Jr. (1996). "Exploring Minority Empowerment: Symbolic Politics, Governing Coalitions and Traces of Political Styles in Los Angel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1:56-81.
- Gilliam, Frank D., Jr. and Karen M. Kaufman (1998). "Is There an Empowerment Life Circle? Long-Term Black Empower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Voter Participation."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33, No. 6:741-66.

- Gurin, Patricia, Shirley Hatchett, and James S. Jackson (1989). *Hope and Independence: Blacks' Response to Electoral and Party Politics*. New York: Russell Sage.
- Hackey, Robert B. (1996). "Competing Explanations of Voter Turnout among American Black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3, No. 1:71-89.
- Haspel, Moshe and H. Gibbs Knotts (2005).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Precinct Placement and the Costs of Voting."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7, No. 2:560-73.
- Jones, Mark H. (1978). "Black Political Empowerment in Atlanta: Myth and Real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39, No. 1:90-117
- Leighley, Jan E. and Arnold Vedlitz (1999). "Race,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mpeting Models and Contrasting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4:1092-114.
- Lublin, David and Katherine Tate (1995). "Racial Group Competition in Urban Elections." In Paul E. Peterson (ed.), *Classifying By Race* (pp. 245-6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cNulty, John E., Conor M. Dowling, and Margaret H. Ariotti (2009). "Driving Saints to Sin: How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Voting Dissuades Even the Most Motivated Voters." *Political Analysis*, Vol. 17, No. 4:435-55.
- Niemi, Richard G. (1976). "Costs of Voting and Nonvoting." *Public Choice*, Vol. 27, No. 3:115-19.
- Palfrey, Thomas R. and Howard Rosenthal (1985). "Voter Participation and Strategic Uncertain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1:62-78.
- Powell, G. Bingham (1982). *Contemporary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Stability, and Viol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rdeshook, Peter C. and Langche Zeng (1997). "Rational Voters and Strategic Voting: Evidence from the 1968, 1980, and 1992 Election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9, No. 2:167-87.
- Riker, William H. and Peter C. Ordeshook (1968).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2, No. 1:25-42.
- Sears, David O. and Nicholas A. Valentino (1997). "Politics matters: Political events as catalysts for preadult soci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1:45-65.
- Tate, Katherine (1991). "Black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1984 and 1988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4:1159-76.
- Teixeira, Ruy (1992). *The Disappearing American Vote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 Tollison, Robert D. and Thomas D. Willett (1973). "Some Simple Economics of Voting and Not Voting." *Public Choice*, Vol. 16, No. 1:59-71.
- Verba, Sydney and Norman H.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Wattenberg, Martin P. (1990).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1). *The rise of candidate centered politic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f the 1980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2002). *Where Have All the Voters Go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lch, Susan and Lorn S. Foster (1992). "The Impact of Economic Conditions on the Voting Behavior of Black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5, No. 1:221-36.

Indigenous Voting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Cheng-hao Pao and Yin-lung Chou

Abstract

Voting participation is vital to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and quality of democracy. Therefore, through studying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voting participation, we may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and quality of democracy.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indigenous people have a lower turnout rate than others, which implies that indigenous people have been alienated from politics. Therefore, this study would like to clarify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of indigenous voting participation by using data from the 2013 Indigenous Political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Surve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olitical empowerment are two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s the KMT has long dominates indigenous politics and the non-KMT candidates have little chance to win, non-KMT supporters incline to not to vote. Therefore, indigenous voting participation may increase if the variation of indigenous electoral politics increases. It will also legitimate government's rule over indigenous people. Furthermore, although political empowerment does have impact on indigenous voting participation, it will be interfered by election schedule. If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s held together with presidential election, voter turnout rate will increase. However,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empowerment will be diluted.

Keywords: indigenous people, voting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empowerment, cost of voting.

Cheng-hao Pa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amkang University.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indigenous politics, congressional politics, electoral and voting behavior, and party politics.

Ying-lung Chou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t Tamkang University.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litical methodology, survey research, voting behavior, and party politics.